

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JIAN SHI

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史

庞松 陈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史

庞松 陈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庞松,陈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ISBN 7-208-03229-7

I . 中… II . ①庞… ②陈… III . 现代史 - 中国 - 1949~
IV .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301 号

责任编辑 陈敬山
封面装帧 赵小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庞松 陈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插页 1 字数 480,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229-7/K · 766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喷薄欲出	(1)
一、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1)
风雨如磐	(1)
开天辟地	(7)
争取和平建国	(11)
历史的转折点	(13)
决战决胜	(18)
二、擘画蓝图	(21)
新国家的大政方针	(21)
新国家的经济构成	(27)
新政协的筹备	(30)
三、缔造新中国	(33)
开国盛会	(33)
建国纲领	(36)
崭新的政府	(40)
第二章 旭日初升	(44)
一、巩固政权与稳定经济	(44)
统一大陆和清匪反霸	(44)
对外关系与中苏同盟	(49)
初建国民经济的基础	(51)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55)
争取财政经济基本好转	(59)
二、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	(62)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62)
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67)
镇压反革命和工矿民主改革	(73)
清除旧社会的遗毒	(77)
三、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	(81)
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81)
民主建政和民族区域自治	(88)
教育文化的改革和初步建设	(92)
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99)
经济恢复的奇迹	(102)
四、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05)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05)
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110)
推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117)
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124)
五、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	(130)
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	(130)
文化建设和社会领域的斗争	(139)
增强执政党的团结	(146)
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初步建设	(151)
初登国际舞台	(156)
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166)
三大改造的急促完成	(166)
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80)

深刻的社會變革和遺留問題	(182)
第三章 耀日疾風	(186)
一、全面建設的開局	(186)
以蘇聯為鑑戒	(186)
探索的積極成果	(192)
經濟關係的調整	(196)
二、“多事之秋”	(204)
兩類矛盾與整風運動	(204)
驟起急風暴雨	(210)
三、“大躍進”年代	(218)
趕超戰略和批判反冒進	(219)
“大躍進”高潮	(226)
人民公社化運動	(233)
四、糾偏與逆轉	(241)
降溫和壓縮空氣	(241)
風雲突變	(251)
“反右傾”運動	(257)
陷入嚴重困難	(260)
五、以退為進的調整	(264)
“八字”方針和農業的調整	(265)
經濟各部門的初步調整	(272)
堅決退夠 全面調整	(277)
文化和政治關係的調整	(284)
六、國際鬥爭和對外關係	(292)
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鬥爭	(292)
中蘇關係的惡化	(295)
中印邊界武裝衝突	(299)

积极发展多边对外关系	(301)
七、前进中的两种趋向	(304)
重提阶级斗争	(305)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07)
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	(316)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321)
第四章 蔽日遮天	(331)
一、风暴来临	(331)
两个对立的文件	(331)
“炮打司令部”	(340)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345)
二、全国动乱	(349)
夺权风暴	(349)
二月抗争	(352)
内乱悲剧	(355)
动乱的升级与反复	(357)
三、纠“左”与顿挫	(364)
庐山之变与林彪集团覆灭	(364)
收拾危局和批极左的努力	(370)
蹒跚中的国民经济	(379)
动荡中开辟外交新格局	(385)
四、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	(391)
“批林批孔”运动	(391)
“组阁”风波和四届人大	(394)
雷厉风行 全面整顿	(398)
五、“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407)
“反击右倾翻案风”	(407)

人民觉醒与“四五运动”.....	(409)
粉碎“四人帮”.....	(413)
第五章 拨云见日.....	(419)
一、徘徊中前进	(419)
历史关头的不同选择	(419)
“两个凡是”的阴影	(423)
冲破禁锢的合声	(426)
主题的明晰	(430)
二、走向伟大的转折	(437)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437)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4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448)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456)
三、系统的拨乱反正	(458)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458)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462)
社会政治关系的调节	(465)
长治久安的举措	(46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74)
四、改革开放的起步	(477)
农村经济改革的突破	(477)
城市改革的试点	(482)
创办经济特区	(485)
第六章 日升月恒.....	(492)
一、全面开创新局面	(492)
历史的结论：走自己的路	(493)
修订宪法与加强民主和法制	(496)

发展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501)
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505)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505)
农村第二步改革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510)
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	(515)
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	(522)
军队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524)
三、跻身国际社会和推进统一大业	(532)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532)
外交工作的重大进展	(535)
“一国两制”的构想	(543)
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	(546)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54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548)
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554)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557)
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561)
五、渡过严峻考验	(564)
价格“闯关”和经济波动	(565)
北京政治风波与苏联东欧的政治震荡	(567)
实现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571)
在治理整顿中稳步前进	(574)
第七章 如日中天	(580)
一、大潮新起	(580)
南方谈话冲击波	(581)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中共十四大	(585)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体系	(588)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591)
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93)
计划模式的关键性突破	(593)
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	(599)
经济加速发展与“软着陆”	(603)
对外开放的新进展	(606)
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609)
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	(610)
制定跨世纪的宏伟纲领	(615)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	(617)
规制立范与反腐败斗争	(620)
四、“一国两制”的实施	(622)
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的谈判	(622)
制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及香港回归	(624)
促进两岸高层的沟通	(630)
五、迈向新世纪	(635)
转承启合 继往开来	(635)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639)
新的所有制结构	(644)
跨世纪的新一届政府	(649)
迎接 21 世纪的太阳	(652)
后 记	(658)

第一章 喷薄欲出

一、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风雨如磐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一向以经济的繁荣、疆域的拓展、文化的灿烂、民族的融和而闻名于世，它的伟大成就和发明创造，曾给予世界历史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但是，自19世纪中叶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在国家地位上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资本帝国主义各国侵略中国，除赤裸裸的掠夺以外，还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攫取在华的种种特权。在中国的领土上，有外国的殖民地——租界、租借地、割让地等“国中之

国”；中国主权的行使和国家的内部事务，经常受到外国的支配和操纵，使中国虽然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却丧失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几乎大部分属性。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造成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统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派军政势力各霸一方，争战不已，政出多门，律令不一。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无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的中央政府，也没有整个国家的统一，基本上处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一盘散沙的境况。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从来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传统。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政治，但未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的民主状况并无根本改变。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的统治，本质上都带有专制和独裁的性质，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而且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也没有政治发言权。这些，就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和国内的基本政治状况。

近代中国在经济形态上属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近现代经济的转型带来极其复杂的影响。它强行打开了封建统治下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门，迫使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城乡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下畸形成长，勉强维持民族工业及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推动资本、劳动力的流动和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使之逐渐成为反映社会分工、扩大各要素市场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全国的埠际贸易增长了四十余倍，沿海一带出现十分繁荣的通商大埠，并辐射周边地区，形成初步的网状大流通商路以及商路沿线的若干流通枢纽，某些地域性的市场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并出现像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

的贸易、金融中心。应该说，这些变化为自给型经济向商品货币型经济的逐渐过渡，准备和积累了基础性条件。

但是，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帝国主义利用强权把持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以不等价交换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代表的买办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密切结合，对民族工业和农民小生产者实行直接的经济压迫和重利益剥削，市场交易过程中渗透着政权、族权、亲权、地方霸权等诸多非经济因素；绵延不断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造成城乡隔绝、民生凋敝、流通堵塞、金融混乱，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这些恶劣的环境因素，在根本上阻滞了中国走向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直接障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总的来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一方面逐渐瓦解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完整的封建经济形态，客观上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生长的机遇和某些便利条件。20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初步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趁着帝国主义战争的间隙，在一些行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另一个方面的严重情况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这种发展，始终受到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的扼制和压迫；同时，又不断为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内战和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战争所阻滞。直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本来已十分虚弱的民族工业遭到更大的摧残和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疯狂扩张、急剧膨胀，大大强化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地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倍感艰难，日趋衰落，大多濒于破产、半破产境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垄断经济命脉和商品市场，封建势力又设置重重障碍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苦于在夹缝中求生存，虽有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很不足，力量非常薄弱，在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也是畸形的。因而，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包括各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及相应的经济关系，远未发育成熟。就全国而言，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极不平衡，仅在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少数沿海和近海地区，农产品中经济作物的生产同国外市场有着较密切的联系，通常有50%—70%的农产品用于市场交易，而在内地大部分地区，农产品的上市量仅在5%—10%之间，商品率甚至低于日本近代经济开始起步的明治时代的水平。总之，在近代中国，尽管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封建生产关系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些情况，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在对外部关系方面，主要是严重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内部关系方面，主要是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国内商业、金融业、关税、财政等经济命脉，都由帝国主义控制或操纵。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一经与世界产品、世界市场发生关系，农民小生产者就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生产安排，只能听由国际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世界市场摆布。工业方面的依附性，首先是在机器、设备、技术上依赖外国；相当一部分资金要靠外国银

行调剂；许多工业的原料、材料、燃料要从国外进口。在工业结构方面，也不能不适应帝国主义掠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需要，中国的轻纺业、采矿业、修配业、消费品的生产比例畸重，几乎没有或很少有重工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工业。在地区分布上，中国仅有的工业，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帝国主义设有租界、便于控制的口岸城市；广大内地城市工业发展水平极低，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金融业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更强，外国在华银行不仅能在中国发行纸币，而且还强力操纵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外汇比价，并通过所谓经济贷款和政治借款，掌握了对中国铁路、电信等重要部门的财产、收入及政府关税、盐税、厘金等捐税的监督和管理，使中国财政的支配权大部分落入外国人手中。总之，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强大的外国资本的排挤下，又受到封建买办势力的束缚，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这就使近代中国在经济上和教育、科学、文化上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一切爱国的团体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派别，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多少仁人志士舍身取义，奔走呼号，力主“变法维新”、“富国强兵”，举凡倡洋务、办实业、兴新学等种种救国方案均逐一推行实验，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些努力统统失败了。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正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西方国家竭尽拼抢世界市场份额，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唯有不遗余力地掠夺和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源，自然不允许拥有偌大市场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

主义制度，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总之，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既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又是中国民族灾难的根源。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领导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辛亥革命，在风雨如磐的中国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从此不得人心，中国人民开始有了新的觉醒。青年毛泽东就曾宣称：既然“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那么，对于推翻一切封建专制的东西，“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就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中国爆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鲜明主题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奋斗而致力倡导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终于在中国找到它的物质承担者和忠实实行者，并且日益走向别开生面的创新。

主要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力量过于强大的缘故，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终究未能实现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在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八年间，中国曾经历过许多届各式各样的政府：从袁世凯窃夺民国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到皖、直军阀在“恢复共和”名义下控制的北京政府；奉系军阀操纵下的临时执政府和军政府；在南方，曾短暂地建立过护国政府和护法政府；孙中山的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期间，出现过宁汉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最后，号称使中国“归于一统”的是 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要以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两大统

治集团为代表的历届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实行的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政。这只能使中国社会继续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根本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国家的富强。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有生之年，曾以“护国”、“护法”相号召，苦心孤诣，砥力奋斗，但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夹攻下，终未实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所创立的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也被蒋介石集团窃据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在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命运的重大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

开天辟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创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同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致力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大联合，迅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走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系统地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步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富有独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